

当代西方建构主义取向评析

刘永涛

进入 9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活跃着一种称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新型研究取向。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建构主义既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提出挑战,又避免囿于自 80 年代以来西方批评理论及后现代思潮所热衷的国际关系超理论(metatheory)层面的讨论,而是在吸取它们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谋求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经验分析来阐述自身的观点和思想。近年来,建构主义者不断将这些观点和思想梳理成一些日趋成熟的理论命题,并产生一批经验分析的学术成果,给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占居支配地位。然而,进入 80 年代,构成性理论研究开始复兴,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省和清算,在学术上表现为各种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争论”,亦称“第三次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对占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发出猛烈挑战,谋求重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不是一种单一理论,而是一个“家族”,其“成员”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这些分支的研究侧重点和取向不尽相同,但却集合于批评理论的“旗帜”下,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共同倡导批评理论的四项学术方针:第一,在认识论方面,反对理性主义所谓客观和主观之间可以分离的假设,对理性主义以实证和经验的方法所获得的“客观”和“科学”的国际政治知识提出质疑,指出任何“理论永远是为某些人服务并为了某种目的的……世界是从一定的国家或社会阶级的立场得以观察的”;第二,在本体论方面,对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及人的行为的概念提出挑战,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指出认同对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反对理性主义所倡导的单一的“科学”或“实证”的方法,提倡对知识的一般性研究在取向上呈多元化,在肯定探索因果关系方面采取解释性方法的同时,更强调

从学术渊源上讲,建构主义在 9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出现与 8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第三次争论”有着密切关系。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体分为两类:解释性理论和构成性理论。解释性理论,是指那些侧重提出并检验理论假设,提供因果关系解释,对事件进行描述并对一般趋势和现象作出说明的理论。它们强调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再现一幅客观而真实的国际政治画面,为解决政策难题服务。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理论就属于这一类。构成性理论则注重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哲学基础的研究,强调理论上的自我反省和清算对正确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性质及特征的重要性。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便可归于这一类。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由解释性理论

Steve Smith, "The Self - 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 - 27. 亦见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81), pp. 128 - 137. Robert W. Cox, p. 128.

在探究事物如何发展并对其含义给予说明方面采取诠释方法;第四,在价值论方面,反对理性主义关于价值和科学可以分离的假设,以及科学知识具有价值中立特征的看法,指出价值论和伦理论在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政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批评理论者在 8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展的探讨活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动摇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解釋性理论的哲学根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主流的理性主义者感受到了挑战。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承认,批评理论指出了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东西,对国际关系中的主体间问题所作的洞察和见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指出批评理论者在发展自身理论的过程中需要“使批评理论自身具有先验的内容”。新现实主义者指出“批评理论者没有提供经验上的分析去支持他们的理论。”尽管一些批评理论者在尝试将自己的理论用于世界政治现实的研究中,但是,从整体上讲,做得还远不够。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为了回应理性主义的指责、推动国际关系批评理论的发展,加上冷战的结束进一步揭示出主流理论的不足以及新一代研究者的崛起,建构主义便在 9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应运而生。

二

建构主义把自己称作是批评理论“家族”的“新成员”。它充分吸取了 8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取社会学研究取向对世界政治作经验分析,以弥补早期的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在这方面的不足,同时又吸取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形成一种介于早期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种世界政治研究取向。

建构主义同其它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分支一样,其学术思想来源于当代西方批评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尤根·哈伯马斯、哲学家米歇尔·福科等人。研究取向带有强烈的历史及社会学研究视角,关心世界政治的历史演变及社会建构,因此有“建构主义”之称。

建构主义大体有两种形式: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建构,后者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现代建构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建构主义,它赞成新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研究国际政治的观点,不注重国家层面的研究;另一种是整体建构主义,它注重历史角度的研究,更为具体地关注国际政治变化的动力问题,把国内和国际结构及过程视为全球社会秩序整体的两个方面,并且考虑这种社会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彼此构成关系。后现代建构主义对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感兴趣,注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条件,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语言、含义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一分支更有兴趣探索关于事物变化的“如何”之类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为何”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分支更重视对世界政治进行诠释(interpret)而不是解释(explain)。

无论是现代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都谋求探讨和阐述社会中三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命题,以及它们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第一,物质结构之外,还存在社会结构,它表现为社会的规范或观念。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作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此外,建构主义还认为,这类制度化了的含义系统确定着行为体的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被认为对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构成影响。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占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不考虑利益的形成问题,而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建构主义则认为,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解释理性主义所误解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174.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 - 5), p. 44.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 73.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 398.

第三,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相互构成关系。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既认为这类结构具有相当的构成力,又认为它的存在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行为体的知识实践之外。

建构主义者趋于使用“规范”、“认同”和“文化”等一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概念去理解和说明世界政治。

“规范”(norms)属于一种社会约定,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世界政治中各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且还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建构主义承认国际体系背后存在着行为体物质实力分配和权力结构关系,但是更强调这个体系的社会特征,认为它也是由与规范有关联的机构所组成。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需要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则、理解和与其它者的关系而形成的。

“认同”(identity)这一概念来自社会心理学,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它者”(Others)的关系而形成的。建构主义对认同和利益的建构问题感兴趣,并提出两种认同类型:整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前者指构成行为体个体化的内在本质,强调行为体如何在整体上与其它行为体的区别性特征,如行为体的整体意识和经历、物质资源、分享的信仰价值或知识等;后者指行为体在看待其它行为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结构特征,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利益。建构主义感兴趣的是行为体之间的“集体认同”,即自我和其它者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其它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建立集体认同的基础是行为体之间形成移情联系。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

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的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社会认同反映了利益,而利益反过来推动国家的行动。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国家的认同。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是各自封闭在自己的领域里,国内政治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

三

建构主义者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批评理论应用于对世界政治的经验分析,对世界政治给予重新理解和说明,而不是停留在“超理论”层面的争论上。近几年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诸多建构主义经验分析著作,它们采取建构主义的研究取向,运用经验的分析方法,分别探讨了国家安全问题、国际机制与组织的作用和国际规范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说服力和解释力,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部:

美国康乃尔大学彼得·卡森斯坦教授主编的《国家安全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1996年),该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建构主义对国家安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大都为近年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者。正如书的主编所说,这些研究不谋求提出新的国家安全理论,而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提出新现实主义所忽视的视角,即社会文化视角。作者们以极为新颖的思考方式,运用大量翔实的案例,对常规武器扩散、核武器及化学武器扩散、海外人道主义干预、结盟、北约组织等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经验分析,提出清新并给人启发的理解和解释。作者们认为,在国家安全方面,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在因果关系上具有重要性;这些结构的结果不仅对国家的安全行为加以限制,而且还影响国家的认同和安全利益的形成。该书开篇及结尾部分的两篇文章则集中对建构主义取向的精髓加以阐述和评价,指出建构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主义与传统的主流理论之间的区别以及确定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值得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人们认真阅读。

玛莎·芬尼莫尔撰著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年),该书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是开篇第一章,关于国家利益的建构问题。作者指出,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社会体系中规范和认同的影响和规定。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定位后,国家才有可能相对地确定追求自身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等问题。换言之,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体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不断处于变化过程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然后,作者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案例进行研究,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国际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合作领域所具有的作用,论证她所提出的国家利益观。

美国学者奥蒂·克洛茨出版的《国际关系中的规范:与种族歧视的斗争》(1995年),该书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对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实施制裁,尽管它们在过去与南非在战略和经济上曾建立过有力的联系?作者选择美国、英国和津巴布韦作为案例进行经验研究,认为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出现全球性的种族平等规范,并探讨这种全球性规范如何进入国家层面,对各种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带来影响。尽管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物质上不愿意对南非进行制裁,但是,它们在这类规范的引导下重新确定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因此,在作者看来,国际规范充当了一种构成性角色,它们不仅调节国家的行为,而且影响国家的认同。

四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或者说,一定时代的人的经历活动促使产生一定的理论需求。当一种理论被表述出来,人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考察,把它所隐藏的分析视角揭示出来。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取向盛行于9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领域,正在将它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思想梳理成日趋成熟的理论命题,这说明,随

着冷战结束,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要求人们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未来世界政治不仅取决于实际所发生的事件,而且取决于人们如何去理解和说明它们,以及取决于在理解和说明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视角。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除了物质实力的分配外,还由社会关系所组成;强调由于受社会规范和认同的作用,国家的行为有时需要有利他性,社会规范往往胜过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强调规范、认同和文化等变量决定、影响或改变国家的利益和行为等等。所有这些都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思维更新或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主义谋求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世界政治,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而对长期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诸传统概念如威胁平衡、安全困境、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民主和平等提出不同的叙述。

然而,建构主义本身正处于发展和追求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可能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由于西方占主流的传统理性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研究国际政治的过程中不应该考虑社会文化及规范或观念等变量,因为这类变量只关心回答世界政治应该如何的问题,带有强烈的主体色彩,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测定,因此,建构主义似乎面临一个如何更多地从经验分析的层面上去实证一些主体性问题的挑战;另一方面,建构主义只是一种社会探究取向,或者说仍然是一种方法论,还不能说是一种理论,因此,建构主义者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是理论形成问题。建构主义者在指出了社会建构的重要性之后,需要进一步说明这种社会建构在何时、如何和为何发生的问题。建构主义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规范从哪里而来?国际规范如何得以公正合理地制订出来?规范得以实施的保证是什么?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集体认同如何加以实现?等等。

尽管如此,在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繁杂多样的情形下,建构主义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和说明世界政治研究取向,以其更为平衡、更为贴近世界政治脉搏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